

數位時代仍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  
——《為什麼新聞業依然重要》書評

徐桂權\*

---

書名：*Why Journalism Still Matters*

作者：Michael Schudson

出版日期：2018年

出版社：Cambridge, UK; Medford, OR: Polity Press.

---

---

投稿日期：2020年7月2日；通過日期：2020年8月14日。

\* 徐桂權為廣州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e-mail: xugq5@sysu.edu.cn。

本文引用格式：

徐桂權（2021）。〈數位時代仍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為什麼新聞界依然重要》書評〉，《新聞學研究》，147: 181-190。DOI: 10.30386/MCR.202104.0010

2018 年，已年逾七十的美國新聞社會學家 Michael Schudson 出版了新著《為什麼新聞業依然重要》（Why Journalism Still Matters）。該書既是 Schudson 對數位時代與「後真相」時代美國新聞業（journalism）面臨問題的觀察和分析，也體現了他從事新聞業研究四十餘年的思想成果。該書包括四個部分：新聞業的歷史；當代新聞業深探；新聞業與民主的思考；以及 Schudson 關於學界對其評價的回應。本文不打算對該書從頭到尾地進行介紹，而試圖圍繞作者的問題意識來理解其學術理路。同時，本文也試圖以該書的出版為契機，探討 Schudson 的新聞思想在數位時代是否依然具有啟發性，以作為我們從事新聞業研究的參照。

## 美國新聞業的問題和處境

Schudson 在本書序言中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新聞業重要嗎？」他的回答是：「比以前更加重要了」（Schudson, 2018, p. 1）。他解釋道：這裡所說的「新聞業」，指的就是專業化的新聞業（professional journalism）。為此，他引用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前同事丹尼爾·哈林（Daniel Hallin）的觀點：在專業化的新聞業裡，新聞從業者「強烈服從於職業規範、甚於政治理念」（Hallin, 1994, p. 171）。Schudson 認為，當今時代有各種各樣的新聞機構，包括具有明顯政黨傾向的新聞機構也是有用的，但他強調的就是這種專業化的新聞機構，在當下依然重要。

Schudson 在其過去的著作中已經詳述了專業新聞機構的重要性，但本書並不僅僅是老調重彈。他強調「依然」，顯然是要為美國近年來，特別是 2016 年總統大選以來新聞業遭遇專業性的質疑作出辯護。在接

受《中國社會科學報》採訪時，他就此說道：

我不認為美國新聞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已經倒塌，或者認為 2016 年的總統選舉被媒體不公正地報導，……媒體是否有不公平報導呢？是的，有些時候會出現。但整體上來看，美國新聞界主腦們的表現令人稱讚。我這麼認為的理由就是主流的新聞媒體（包括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用無可質疑的證據，揭露川普政府高級官員撒謊與受賄，從而將他們拉下馬。比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的「通俄門」和美國衛生與公共事業服務部部長湯姆·普賴斯（Tom Price）的「包機門」。這些案例最有意思的是，沒有任何共和黨領袖否認媒體提供的證據，包括川普總統本人（李玉潔，2018，頁 2）。

Schudson 對美國專業新聞機構的辯護，既根植於美國特定的政治和經濟處境，也與其本人的學術經歷和思想脈絡相關。在美國的政治語境，新聞業之所以重要，就是因其與民主體制的運作密切相關。Schudson 堅定地認為，美國的民主就是「代議制民主」或「自由民主」，而新聞業是維繫這種民主體制運作的必要機構。然而，今天美國的民主似乎越來越面臨「民粹主義」的挑戰，專業的新聞機構也與建制的政府機構一同受到政治上的質疑。與此同時，隨著數位媒體的發展，新聞業的內涵和邊界變得模糊，傳統新聞業的權威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從經濟方面而言，專業新聞機構的經營也存在問題：美國媒體對廣告過分依賴，但這種二次售賣模式正面臨崩潰；另一方面，美國的公共廣播電視系統欠發達，也拒絕接受政府直接資助。這種政治和經濟上的挑戰，都使美國新聞界的專業性遭受嚴峻的沖擊。

從 Schudson 的個人經歷來看，自 2009 年全職加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後，他越來越關注美國新聞界的現實問題。他也承認，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從教經歷讓他對「專業主義」的議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認為，在哥大新聞學院，有兩個神聖的詞語：「報導」（report）和「故事」（story）。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就是通過「報導」來探尋真相，尤其要放下自己的假設，進行深度的報導。Schudson 認為，這就是「客觀性 1.0」的理念——強調準確、事實和平衡，這點在今天依然重要（Schudson, 2018, p. 8）。「故事」則意味著新聞工作者要足夠了解報導對象所處的脈絡和背景，以及知道通過怎樣的架構來講述這些事實，使之適於外界的理解。這看似與前者存在張力，因為後者難免需要作者進行選擇和判斷（judgement），但這種判斷不是個人化的判斷或政黨性的判斷，而是專業性的判斷（Schudson, 2018, p. 13）。Schudson 把這個要求稱為「客觀性 2.0」的理念，並認為新聞媒體的這種詮釋在當今時代變得更加必要，也更加清晰可見。由於數位媒體上的「判斷」變得愈加無所不在，專業新聞機構更需要捍衛自身的專業性判斷，這是其在數位時代繼續立足的基礎所在。

## 數位時代美國新聞業的變與不變

Schudson 既是新聞社會學家，也是新聞史家。他的論著之鮮明風格是兼具歷史經驗與思辨分析、史論結合、論從史出，這一風格在本書中繼續得以體現。本書專門探討新聞史的文章並不多，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把握其「新聞史觀」，這樣更能幫助我們認識美國新聞業「變」與「不變」的趨勢。

在美國新聞史的研究中，Schudson 最持續關注的議題就是新聞「客

觀性」的理念。第三章〈新聞業是個專業嗎？客觀性 1.0，客觀性 2.0 及其超越〉是首次發表的論文。這篇文章勾勒了美國新聞客觀性理念的發展脈絡：19 世紀末新聞業作為職業領域興起；20 世紀二〇年代形成的「客觀性 1.0」，意味著新聞業獨立於市場和國家，這種職業規範在五〇、六〇年代達到頂峰；自六〇、七〇年代以來，「客觀性 2.0」形成，它堅持新聞記者必須為他們報導的事實提供脈絡、解釋和分析。Schudson 以量化的內容分析，證明這種「脈絡化的報導」（contextual reporting, Schudson, 2018, p. 55）自六〇、七〇年代以來逐漸上升的事實。「客觀性 1.0」和「客觀性 2.0」的結合，使得過去半個世紀裡美國新聞業得以成為歷史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新聞業。那麼，是否還會有可被稱為「客觀性 3.0」的新模式出現呢？Schudson 表示自己不能對此進行預測，如果有的話，更可能的要求是媒體在堅持給公眾提供事實與理解背景的同時，增添新的成分——同理心／移情（empathy）。即使「客觀性 3.0」尚未形成，「客觀性 1.0」和「客觀性 2.0」的結合足以支撐專業的新聞機構來探索真相（Schudson, 2018, p. 67）。Schudson 認為，我們沒有身處「後真相」時代。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任何時候真相都極其重要；當人們有科學的知識和客觀的經驗時，並不會被誤導（Schudson, 2018, p. 94）。因此，堅持客觀性規範仍然是新聞業的專業主義基石所在。

近年來，Schudson 的傳播史研究的重心從新聞業本身拓展到了更廣闊的美國公共生活史，後者為理解新聞業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語境。第八章〈公民身份：「辛普森一家」〉可被視為《好公民：美國公共生活史》（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Schudson, 1998）一書的簡寫本。在這篇文章裡，他很幽默地以動畫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人物來比喻美國四個歷史階段裡公

民身分的變遷。1789-1820 年可被稱為「同意政治」時期，公民所要做的就是精英主導的民主體制下對紳士的統治恭敬地表示「同意」，這就彷彿 Simpson 一家中母親 Marge 的形象；19 世紀二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是「政黨政治」時期，公民、報紙、商人都應該對其所屬政黨效忠，這就好比父親 Homer 的形象，熱情、富有力量、但是容易暴躁；從 19 世紀九〇年代到 20 世紀二〇年代，不依附於政黨的、能獨立做出理性判斷的「知情的公民」成為一種民主理想，正如聰明的女兒 Lisa 的形象；從 20 世紀五〇年代至今，黑人的民權運動使「權利政治」興起，理想的公民就如同不恭的兒子 Bart 的形象。Schudson 認為，未來的理性公民可能是前述四種公民身分的結合體，這就好比 Simpson 一家中嬰兒 Maggie 的形象。但準確地說，Schudson 更推崇的是「監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它使選舉不再成為民主參與的中心，而讓日常的政治監督成為常態。這種「監督式民主」因網際網路與數位媒體的興起而擁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其起源則在 20 世紀五〇年代就開始奠定了基礎（Schudson, 2018, pp. 137-148）。

網際網路與數位媒體的興起也帶來一些爭鳴，比如公民媒體或社交媒體是否帶來公民參與的擴大化，同時也帶來專業新聞機構的衰退？對於這種「此消彼長」的論調，Schudson 並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新聞業確實在發生變化。在《新聞社會學》第二版（The Sociology of News (2<sup>nd</sup> ed), Schudson, 2011）中，他用了新的一章討論數位時代裡新舊事物之間日益「模糊」的表現——讀者與作者之間的界限模糊；新聞機構的採編部門與經營和廣告部門之間的界限模糊；營利的、非營利的與政府的新聞機構之間的界限模糊；書籍、報紙、新聞雜誌與博客、社交媒體、推特等傳播新聞的媒體形式之間的界限模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界限模糊。然而，隨之時間的推進，如今 Schudson 益發認為，這

種變化的影響可能被誇大了。一方面，傳統的新聞業巨頭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通過網路新聞的生產，已經能夠很好地適應數位時代的挑戰；況且，新聞業還出現了多種活力四射的、合作、參與的創新生產方式（Schudson, 2018, pp. 113-133）。另一方面，非營利網絡新聞機構 ProPublica 和時政新聞網站 Politico 等新興的媒介機構亦在「後真相」時代提供了探究真相的可能，但這些機構的工作者基本上是由來自《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新聞「老手」帶領運作的。舉例來說，由於 Politico 網站中兩位記者的爆料，湯姆·普萊斯被迫辭去川普政府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一職。這個新聞調查過程，並不是公民新聞或社交媒體的現象，而恰恰是專業訓練的新聞工作者遵循其新聞價值觀和新聞理想進行專業化操作的結果（Schudson, 2011／徐桂權譯，2020，頁 3）。

根據 Schudson 對於美國新聞業的歷史與現狀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新聞業的「變」主要表現在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在專業性上的完善，以及因應技術的發展而在形式上的變化；新聞業的「不變」則是其對客觀事實的追求，及其促進公共生活和民主政治的努力。不過，這樣的總結仍然帶來疑問：Schudson 在做出這樣的分析時，是否有自己預先的價值立場？或者說，他心目中理想的新聞業與民主的關係究竟如何？這是我們需要繼續省察的問題。

## 「不可愛的新聞界」：Schudson 的新聞與民主觀

談到新聞與民主，一個思想的幽靈時常浮現在 Schudson 的著述中，他的名字就是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本書中，

Schudson 不但在開頭和結尾都引用了李普曼，而且還專門收入了〈與李普曼的幽靈訪談〉（*Walter Lippmann's ghost: An interview*）的文章，其中重點討論了李普曼關於「政治景觀台」（political observatories）的觀點，即公益團體、學會、智庫以及政府內部的自查機構等可以幫助公民監督政府機構和新聞媒體的運作，實現「監督式民主」（Schudson, 2018, pp. 31-40）。而他的著作《知情權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Schudson, 2015）彷彿正是李普曼「政治景觀台」理想的一個註腳。

Schudson 如此推崇李普曼，與著名傳播學者詹姆斯·凱里（James Carey）批評李普曼、推崇杜威（John Dewey）形成鮮明的對比，以至於 Schudson 與 Carey 之間關於媒體與民主（公眾參與）的不同觀點的辯論彷彿就是「李普曼—杜威」之爭的延續。不過，Schudson 卻否定了李普曼與杜威之間存在真正的辯論，認為二人不過是進行了觀點的交流，並且他們都信奉自由主義和科學。Schudson 認為李普曼不是反民主的精英主義者，並且他一再重申李普曼的觀點：民主主要倚靠專家的知識。李普曼並非說普通人因為教育水平或文化素養的局限而要將權威讓渡給專家，而是說現代政府的運作是如此複雜，我們中的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指點政府如何來操作。無論是政府官員、新聞媒體或「政治景觀台」都只具有一部分的專家知識，來承擔其中一部分的責任（Schudson, 2018, pp. 189-190）。在這個意義上，Schudson 理解的代議制民主或自由民主顯然具有結構功能主義的色彩，強調的是在法治下各個政治機構之間的有機協調運作，而新聞媒體亦是其中必要的環節。

2014 年，Schudson 教授因其在新聞業研究領域的傑出成就，被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授予榮譽博士頭銜。格羅寧根大學還為此舉辦了主題為「不可愛的新聞界：與 Michael Schudson 對



話」的研討會，參加會議討論的文章及 Schudson 的回應後來被收入在 2017 年第 5 期的 *Journalism Studies* 中。其中，Waisbord (2017) 指出，Schudson 的學術研究最大的特徵是其「逆向思維」(contrarian thinking)，即對傳播研究中流行的理論和觀點，如政治傳播研究中關注的商談與公眾參與、新聞學研究中熱議的公共新聞業，Schudson 都根據歷史事實的考察和邏輯的分析給予批評和澄清。或許正因為這樣的思維取向，在專業新聞機構被飽受質疑的當下，Schudson 不願跟風，及時地站出來力挺新聞業依然至關重要。這種辯護雖然看起來只是重申了他已有的立場——縱有諸般不足，民主仍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來實現社會的自我監督、批評與修正，這種趨於保守主義的立場在這個民粹主義興起的時代恐怕也是一種必要的聲音。

Schudson 對於自由民主、專業新聞機構或新聞專業主義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他一貫的「樂觀的思緒和進步的史觀」(馮建三，2010，頁 7)。他在專刊的回應文章中談到：他欽佩新聞工作者，也認為我們不應該要求新聞工作者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而他自己作為一名教師，有責任保持樂觀，並相信下一代會做得更好。他認為，學者的工作是要提出批評，但如果只是一味提出批評，並不能讓事情變得更好。因此，他還是要訴諸樂觀主義的精神，加上現實主義的評估 (Schudson, 2018, pp. 189-190)。對於華人讀者來說，無論這種信心或樂觀是否站立得住，也是我們值得傾聽的一種聲音。

## 參考書目

- 李玉潔 (2018)。〈範式重構：美國新聞業的社會史——訪美國新聞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邁克爾·舒德森〉，《中國社會科學報》，第 2 版。
- 徐桂權譯 (2020)。〈中文版序言〉，徐桂權譯《新聞社會學》第二版，頁 1-3。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Schudson, M. [2011]. *The sociology of news* (2<sup>nd</sup>). New York, NY: Norton.）
- 馮建三（2010）。〈序言：舒德森新聞觀的演進與美國傳媒改革〉，徐桂權譯《新聞社會學》，頁 1-7。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Y: Norton.）
- Hallin, D. C. (1994). The passing of the ‘high modernism’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D. C. Hallin, *We keep America on top of the world* (pp.170-18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udson, M. (1998).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2011). *The sociology of news* (2<sup>nd</sup> ed). New York, NY: Norton.
- Schudson, M. (2015).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1975*.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2018). *Why journalism still matters*. Cambridge, UK; Medford, OR: Polity Press.
- Waisbord, S. (2017). An argument for contrarian thinking. *Journalism Studies*, 18(10), 1224-1238.